



化圆为方:俄语布克奖二十年

□王树福

新世纪以降的俄罗斯如泥足巨人一般迈着蹒跚摇摆的步伐,朝着民主之路和市场之途坚定而快速地进行着。商业主义和消费文化以混乱不堪却又生机勃勃的姿态敲打着历史之门。许多当代批评家认为,“20世纪末正在发生文学时代的断裂,文学正在失去在社会上的中心地位,作家群和读者群正在急剧改变。”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影响俄罗斯文学嬗变的因素,除了商业主义的侵袭、文学网站的开通、文学俱乐部与沙龙的举办,还有大量文学奖项的设立。其中俄语布克奖在众多奖项之中为世人瞩目:“(俄语布克奖)每年优秀长篇小说评奖提名的过程,以及最终的评定结果,几乎成为90年代上半期文学期刊的主要话题。”在新世纪10年间,俄语布克奖在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界依然影响广泛。

自设立以来的20年间,俄语布克奖以“公开、公平、公正”和“让文学回归文学”为旨归,经由客观而严谨的评选,不仅使该奖评选机制日益制度化和稳定化,更推出了20位卓有建树、风格不同、观念各异、流派不同的小说家,这些获奖作家和作品分别是M.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线》(1992)、B.马卡宁的《审讯桌》(1993)、B.奥库扎瓦的《被取消的演出》(1994)、Г.弗拉基莫夫的《将军和他的部队》(1995)、A.谢尔盖耶夫的《集邮册》(1996)、A.阿佐利斯基的《兽笼》(1997)、A.莫洛佐夫的《他人的书信》(1998)、M.布托夫的《自由》(1999)、M.希什金的《攻克伊兹梅尔》(2000)、Л.乌里茨卡娅的《库科茨基医生的病例》(2001)、O.帕甫洛夫的《卡拉干达的九年》(2002)、冈萨雷斯·伽列戈的《黑中之白》(2003)、B.阿克肖诺夫的《伏尔泰的男女信徒们》(2004)、Д.古茨科的《无迹可寻》(2005)、O.斯拉夫尼科娃的《2017》(2006)、A.伊利切夫斯基的《马蒂斯》(2007)、M.叶里扎罗夫的《图书馆员》(2008)、E.契若娃的《女性时代》(2009)以及E.科里亚金娜的《鲜花十字架》(2010)。2011年,为了纪念俄语布克奖新纪运行10周年(2002—2011),评委会专门举办了“俄语布克奖十周年”活动,最终楚达科夫凭借长篇小说《黑暗氤氲在旧草鞋上》胜出;而1992—2001年度,“俄语布克奖十周年”获奖者则是弗拉基莫夫和他的《将军和他的部队》。

布克奖促进后现代主义在俄罗斯的接受

“后现代主义文学”这一称呼,直到1987年才在俄罗斯文学研究界首次正式出现,而为学界普遍接受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后。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俄罗斯经历了一个由潜流到显流、由地下到地上、由非法到合法的过程: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深深地植根于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土壤之中,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白银时代”文学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文学构成的社会文化传统,与俄罗斯宗教思想资源等有着密切关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和区域特征,早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现代主义中得到孕育。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的形成期,以地下文学、抽屉文学、边缘文学等潜流形式存在,可称之为“第一次浪潮”;70年代至80年代是确定期,以“异样文学”、持不同政见文学、后人文主义文学等样式出现,可称之为“第二次浪潮”;80年代至90年代是合法期,以语言游戏、解构经典、文本拼贴等特征进入文学史,可称之为“第三次浪潮”。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合法化,在很大程度上恰是经由布克奖的评选而完成。《命运线》《审讯桌》《集邮册》《兽笼》《攻克伊兹梅尔》等获奖小说,普遍呈现出碎片化、无情节化、无中心化等后现代主义特色,以及戏仿、粘贴、调侃、镜像等后工业化特征,体现出明显的先锋特色和试验手法。当代作家马克·哈里托诺夫的名作《命运线》通过模拟意识流式双线索结构,围绕一箱手稿和一个人的命运展开故事叙述,在1992年布克奖的角逐中,该小说赢得世界范围内诸多评论家的好评,获得首届俄语布克奖。该小说的出现与整个俄罗斯文学传统,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小说文本在形式上的碎片性、互文性,手法上的拼贴、戏仿、陌生化,内容上与苏联主流话语的对话与争论、消解与颠覆,都带有明显而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印痕。

俄语布克奖复归和延续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当今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功能大多既不经由叙事者讲述出来,亦不经由主人公的现实命运表现出来,而是通过不同

人物的心理或意识流自然折射出来。现实主义作家的审美意识明显由反映社会生活向表现历史人生的感受转变,由干预生活向表现自我的感受转变。在他们看来,语言较之现实更为真实,而文本就是现实,现实世界就是一个囊括一切的鲜活文本,文学和现实之间的传统界限被消解模糊;艺术与现实之间的传统区分已经被抹杀,作家开始从社会思索转入个体生命体验,转向表现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由此,“现实”普遍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对“现实”的个性化感受与自我式体悟。小说《将军和他的部队》坚守俄罗斯古典现实主义叙事传统,以俄罗斯历史上伟大的卫国战争为题材,展现了俄罗斯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和广阔深入的人民战争:“他既遵循古典的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又对逝去的时代有着全面的历史认识,两相结合。在描写人民战争时,显然受托尔斯泰传统的影响,使众所周知的‘托尔斯泰式’主题与情境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现实意义。”经由小说情节和人物意识,作者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思考得以呈现,显示了作者深邃的哲理探究和形象的逻辑思维。尽管小说在俄罗斯文学期刊上引起不同反应,但“弗拉基莫夫的这部长篇小说有力地证明了,当代文学的真正成就,都同深入地把握和反思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相联系,作家要获得成功,他的修辞艺术必须能给读者展示出当代人精神生活的丰富和复杂。”

俄语布克奖使合成性小说文类融入文学长廊

上世纪90年代以降俄罗斯小说创作实践证明,“合成”不仅仅是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一个重要进程,一种和声对话,也是当今俄罗斯小说中一种高度开放的小说体裁,

■书 讯

托马斯·品钦近年力作《性本恶》中文版出版

日前,“最神秘的美国作家”、后现代主义作家托马斯·品钦的近年力作《性本恶》简体中文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该作品是品钦关于上世纪60年代迷幻岁月的隐秘怀念和变形解读,被称为品钦个人历史上最好读、最具个人情怀的作品。

托马斯·品钦是美国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往往以神秘的荒诞文学与科学的交叉结合为特色,对20世纪下半叶的后现代文学全景影响深远。他获得过美国全国图书奖,但拒绝领奖,亦从不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媒体连一帧他的照片都拿不到。品钦的代表作包括《V》《拍卖第49批》《万有引力之虹》等,其中,《万有引力之虹》被评论界称为只能凭借神力才能完成的“大百科全书”。《性本恶》是品钦近年来的最新作品,出版后以其空前好读的故事和空前外露的情感表达激起热烈反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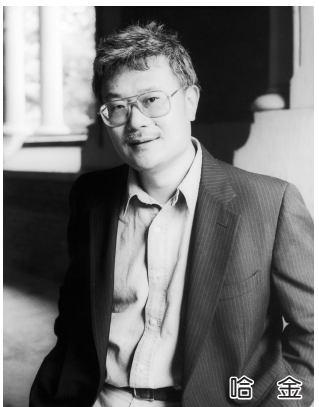
《性本恶》讲述前女友莎斯塔突然出现在洛杉矶私家侦探多克眼前,带来一个无从佐证的故事,一桩离奇绑架案,受害者——她现在的情人——是一个“腰缠亿贯”的房地产商。多克明鬼使神差地撞进了莎斯塔的故事,而且愈卷愈深,江湖各色人在眼前时隐时现,其中包括冲浪手、皮条客、贩毒者、摇滚乐手、犯了命案的高利贷者等。

《性本恶》更像是暮年品钦的一次私人化写作,充满了一个老人对60年代洛杉矶那个曼哈顿海滩的乡愁记忆——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亲历者,更因为他隐秘地怀念着那些嬉皮青年们的天真浪漫和革命理想。(王 杨)

■瞭望台

哈金《南京安魂曲》:无处安放自我救赎

□戴瑶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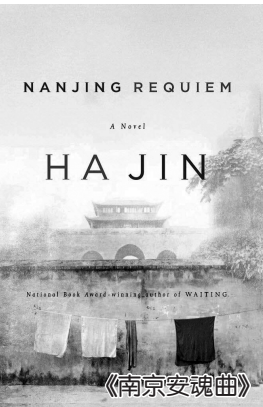


“南京大屠杀”是作家不忍又不敢去触碰的创作素材,阅读每一份史料和书写每一个文字时,都难免让人心中隐隐作痛、悲愤难平。在小说《南京安魂曲》的创作过程中,美籍华裔作家哈金曾两次在放弃与坚持中挣扎,最终还是完成了《南京安魂曲》,因为“这是民族经验,我写的是民族的苦难和耻辱”。

小说中美国人明妮·魏特琳成为了“南京”故事的主角。她是战争年代生活在南京的美国人、金陵女子学院的院长,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她为中国平民提供避难,她救中国女孩基本生存技能,她抗议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她谴责一切践踏人的尊严的思想与行动,她痛苦终未能保住21个女孩的性命,她绝望于自己已被误解和将被遗忘……

哈金的6部长篇小说:《池塘》《等待》《疯狂》《战争垃圾》《自由生活》《南京安魂曲》都存在两生叙事空间,除了《自由生活》关注20世纪80年代移居美国的中国“新移民”之外,其他作品都以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中国故事”为蓝本。而同为“中国故事”的《战争垃圾》和《南京安魂曲》都是以“史”为基础,以“战争”为基本叙事元素。《南京安魂曲》整体结构如同一张“日程表”,简单、清晰。哈金安排着1937年的每一天正在发生的事,并铺垫好将会发生的事。任何一部作品的“日程表”都有自己的特点,它应该是独立与惟一的,不存在模板和规矩,而作家讲故事的动力就体现在这张“日程表”的设计上,他需要规划,预想到可能会出现插图和即将发生的奇迹。哈金为《南京安魂曲》安排的“日程表”,是用扎实的现实主义传达质朴的文学理念,让读者对过往有回忆、对当下有体悟、对将来有期待、对自我有救赎。看似平常的生活,潜伏着生存危机,咆哮着滔天罪恶,翻滚着尔虞我诈,往日的平静与温暖根本让人无暇顾及。与同样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战争垃圾》相比,哈金这次选取以相对偏“柔”的“金陵女子学院”为视点,由它去承载1937年“南京”种种张牙舞爪的“力”:武力、暴力、自私、嫉妒、贪婪。

需要指出的是,“个人”和“国家”是哈金作品的两大关键词,无论是他的短篇还是长篇,贯穿创作始终的理念是对“人”的思考:人在世界中如何自处?个人与国家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同时,除了《南



京安魂曲》之外,哈金的其他5部长篇小说,都是以男性为故事主人公。若搜索以女性为叙事中心的作品,最为典型的是《纽约来的女人》。《南京安魂曲》虽然仍是一部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本应决斗的是“力”(战斗)之较量、昂扬的或是“力”(生命)之美丽,但是这部作品选择放弃将男性作为故事的主要叙述对象。这应该是哈金小说创作思路的一些调整。他的关注者被设定为女性,如明妮、安玲、玉兰。他慨叹和书写在民族大灾难、人性大对决中更为弱小的平凡女人所受到的戕害、荼毒、攻讦。美国人明妮和中国人玉兰都因为这场“屠杀”患上了精神疾病。玉兰是因为遭遇身体的直接摧残而精神错乱,明妮则是因为承受心灵的慢性折磨而精神错乱。而安玲的日本儿媳盈子被战争强行按压进复杂的民族矛盾之中,在战争中失去了中国丈夫,战后又不得与中国亲人相认。由此可见,哈金对女性的关注超越了民族和种族,她们都是这场残酷战争的直接受害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亲历过“南京大屠杀”的明妮和安玲都无法在世间的放置对自我的救赎。安玲在小说中说:“上帝会让我们对这一辈子所做的事情有个交代的。”21个被日军安上“妓女”的身份、从金陵学院强行拖走的女孩,是明妮心病的症结,她因为自己未能保护她们而深感罪孽,这才是她神经错乱的根本原因。当明妮回到美国后,终于没有盼到来自中国南京“金陵女子学院”的信,她认为她被遗忘了、被抛弃了,她不会得到21个中国女孩的谅解,于是明妮通过自杀的方式让自己获得解脱和救赎。

安玲同样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悲剧的人物。她是事件的亲历者,也是小说的叙述者。她的特殊身份使她多次陷入尴尬。儿子浩文娶了日本姑娘盈子,安玲一面目睹日军的疯狂屠杀,一面感受着亲情,战争把她推入了对中日两个民族的惟一认定和必然抉择。被迫做日本军医的儿子以汉奸罪被中国游击队处死,可实际上,浩文对母亲说,“不管我到哪里,都是个贱民”。而安玲不敢去安葬儿子,更要编造儿子是在回中国的路上被日本人杀死的谎言,以此保护亲人和儿子的名声。二战结束后,安玲与儿媳、孙子在日本相见不敢相认。安玲承载的是人世间的“死别”与“生离”的双重大悲痛。

哈金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达是多元生动的,既有血淋淋的场面描写,又有压抑痛苦的间接转述,“金陵女子学院”是对大量平民生命的庇护,更是对根植在人性中的“恐惧”的安抚。小说中,3000多妇女跪在“科学楼”前,痛哭哀求“活菩萨”拉贝不要走,美国人明妮说,她没想到这些妇女对拉贝先生有那么深的感情,而中国人安玲明白,她们是希望受到保护。在1937年的南京,还有一群挣扎在暗无天日的夹缝中的人,他们同样拥有着悲戚的命运。一个小个子姑娘当街遭受玉婷和美燕的毒打,因为她们认为她爸爸设计轮船是为日本人工作,可小个子姑娘不断澄清着一个事实:爸爸同样也要养活这个家。

哈金在《南京安魂曲》中对不同民族间关系的描写细腻而耐人寻味。日本军队对中国平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中国百姓对日本人的刻骨仇恨,以及他们对与日本人有些许关系的中国同胞的无情打击……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他们的关系错综复杂,小说对战争背景中“个人”和“国家”具有深层次的理解和表达。战争让人恐惧,人性的恶也同样让人不寒而栗。战争在破坏着世界,扭曲着人。

“历史应该被如实记录下来,这样的记载才不容置疑、不容争辩。”这是明妮·魏特琳对安玲说的。这也是作家哈金想要表达的。

